

7月出口数据或为“昙花一现” 下半年压力仍未减

产品竞争力仍待提升,专家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速或减半

■ 本报记者 陈青松

近日官方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中,出口数据无疑最为抢眼。

数据显示,7月份进出口总值为3785亿美元,增长6.9%。其中,进口1656亿美元,下降1.6%;出口2129亿美元,增长14.5%。最引人关注的是,7月份中国出口创下17个月新高,远超市场预期。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政府稳外贸政策措施效应的不断显现、欧美经济的好转,都对中 国出口起到了重要的提振作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企业的出口回暖尤为明显。

海外需求回暖 国内政策发力

对于超出市场预期的出口数据,多位专家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分析,主要原因一是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出台的扶持外贸出口的政策正逐渐产生效果;二是外部环境呈现明显复苏态势,如欧美经济正持续恢复。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称,今年以来,我国政府对外贸出口从政策、海关检查和金融政策方面大力支持,这种长效的支持政策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上升。

5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着力优化外贸结构、进一步改善外贸环境、强化政策保障、增强外贸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部署,支持外贸企业稳定增长,让不少外贸企业大为受益。

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支持外贸企业的相关政策,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加大出口。

继国务院出台上述《意见》后,广东省很快发布了国内首个地方落实外贸稳增长的方案,提出25条措施,不仅支持企业抢订单,还提出重奖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及实行出口退税。

而在浙江海宁,当地改革的重头戏之一则是创新符合当地出口企业特色的出口退(免)税模式,服务外向型经济发展。实施出口退(免)



专家认为,下半年中国出口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小。 CNS 供图

税管理新模式后,纳税人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办税负担大幅降低。

除政策效应之外,欧美等国家经济回暖需求扩大也是外贸出口攀升的重要原因。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7月份不仅向发达市场的出口稳健增长,甚至向亚洲新兴市场的出口也显著上升,这可能反映了区域性经济体的需求有所好转。

企业加快创新转型 出口回暖

除稳出口政策和外部需求回暖等因素刺激之外,出口企业自身也通过坚持不懈的技术和产品创新、结构转型,使得出口有了明显好转。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浙江省工商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浙江过半数企业已实施或筹划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目前浙江绍兴的服装企业已走出低迷期,出口形势日益趋好。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浙江朗莎尔维迪制衣公司营销部门负责人介绍,自年初开始公司外贸出口强劲,“仅上半年就出口700多万美元,增幅超过20%”。

在谈到出口强劲的原因时,这位营销部负责人表示,公司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尤其在设计方面与国际需求接轨。比如公司不久前在参加一场国际时尚展后,就吸引了来自欧洲的几位新客户。

而在素有“世界鞋都”之称的广东东莞,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多数加工类鞋企也不得不转型升级。

“我们公司之前以加工传统鞋为主,从前年开始转型升级,比如将低碳理念融入到设计和生产中,专门生产环保款式鞋。这种鞋透气性强,穿着很舒适,而且可以回收利用,减少环境污染,非常受客户欢迎。”东莞一家鞋企的老板向记者介绍。

东莞冠辉服装公司销售负责人李经理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称,该公司95%的产品都是出口,在国外很有市场。“公司出口的是各种中高端产品,利润要比低端产品高很多”。

下半年仍难言乐观

尽管各地外贸企业出口回暖明显,但对于此次“爆冷”攀升的7月份数据,业内人士仍表达了诸多质疑。

首创证券研究所所长王剑辉认为,7月出口增速应该是不可持续的。“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外部环境有明显的改善,政府对出口的支持力度也并没有显著加大,人民币汇率也比较稳定。最大的可能是前期没有实现的一些出口订单,延迟到7月实现了。”王剑辉表示。

申银万国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也认为,7月份出口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但这么高的数据可能有偶然性,下半年能看到恢复,但很难保持平均两位数的增长。

潘向东亦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由于去年下半年出口基数较高,今年7月份如此高的增速在未来保持也是有一定难度,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速在4%—5%左右。”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7月份将是今年最好的情况,接下来的五个月里保持14%的增速基本无法实现。

事实上,《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虽然全球经济回暖趋势逐渐明朗,但用工成本和原材料上涨、人民币升值等影响出口的压力仍然存在。

(下转第十一版)

自贸区发力 中国总部经济再提速

专家称与国际水平仍存差距

■ 本报记者 王莹

上海自贸区挂牌十一个多月来,一系列金融和贸易创新举措不断吸引着跨国公司。

近日,上海自贸区又迎来12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至此,上海自贸区内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已经增至60家,以平均每月6家速度递增。而截至6月底,外商在上海累计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到了470家。

“跨国企业总部参与自贸区发展,结合自贸区的优惠政策环境,对跨国公司扩大发展业务,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配置资源,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将发挥重要作用。”中资东方投资基金公司研究员张艳军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政策红利的吸引力

据了解,此次进驻上海自贸区的12家跨国企业母公司业务涉及工程和建筑设备、汽车系统和零配件、电子设备、物流、汽车销售服务等多个行业。其中,瑞典沃尔沃集团、荷兰托克公司、芬兰瓦锡兰集团、达能集团、意大利杰尼亚以及全球三大物流服务商之一的世达威等多家知名跨国企业均位列其中。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上海自贸区优惠的政策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落户极具吸引力。

2014年1月和5月,上海自贸区先后出台的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和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两项新政,成为跨国公司总部向区内集聚的重要推动力。

索尼物流贸易中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胡艳向记者表示,外汇资金集中试点运行之后,企业可对境内各分支机构进行集中轧差(抵消对冲),轧差量可降低50%左右,一年可以节约的财务成本多达几十万美元。

据了解,跨国公司一般在全球设有2到3个资金结算中心,以往运作模式通常是下单、结算在海外,而货物制造和运输在中国。

“落户上海自贸区后,作为地区总部,公司不仅仅做物流配送,还承担地区资金结算的职能。”德国伍尔特集团内部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这样能有效降低跨国企业甚至其海外关联公司的融资成本,还能更具主动性、灵活性地推动其在国内外的投资与业务发展。

而贸易便利化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上海自贸区的又一原因。

一位从事过跨国贸易的企业人士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以前货物进出上海海关需要贸易合同、报关单、外汇审批单等,现在在上海自贸区内只要有进出口合同,不用再看报关单。简便的程序使上海可以成为跨国企业供应链管理基地,也使发展离岸贸易成为可能。

引领中国总部经济发展

“上海自贸区发展总部经济的经验主要是贸易创新和金融改革,未来可对其他地区发展总部经济提供借鉴意义。”张艳军表示。

而随着上海自贸区总部经济的发展,专家表示,将带来整个中国总部经济的进一步提升。

“上海的总部经济不只是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带动长三角的作用,还带有国家级的发展战略使命。”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开艳表示,从国家整体发展来看,总部经济必然伴随着产业集聚,跨国巨头总部在同一地区密集布局之后,其经济影响力会以几何倍的效应放大,反过来还能吸引更多优质国际资源进入中国。

据了解,上海市于2002年开始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10多年来,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在上海发展迅速。

“总部经济是上海经济创新转型的新增长点。”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表示。

“除了为地方财政贡献突出之外,在总部经济模式下,企业总部、研发中心等在大城市或发达地区聚集,能够充分利用人才、信息、研发等高端资源,最大限度释放创新资源效能,产生更多的技术创新成果,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青岛市国内经济合作办公室副巡视员王民官表示。

仍与国际水平存有距离

然而,有专家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作为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之一的上海,与纽约、东京、新加坡、香港等城市相比,仍然存在差距。

最明显的是数量。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统计,2012年已有约4200家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地区总部。而上海作为国内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城市,目前数量上还不足500家。

业内人士表示,除了数量,目前上海自贸区的开放程度、人才储备和对国际规则、规范的适应等方面还远低于新加坡等国家的水平。

“主要还是在金融、外汇管理制度等方面开放不足。此外,航运、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待完善。”张艳军表示,另外,目前国内境外放款需求主要通过外保内贷、内保外贷、外汇委托贷款等方式实现,便利化程度低,也需要支付较大成本。

观察



保险“新国十条”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再加码

■ 莫开伟

8月13日,保险业“新国十条”终于落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关专家表示,与旧版“国十条”相比,“新国十条”更加贴近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更多强调保险业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社会治理的作用,保险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笔者看来,保险“新国十条”确实具有上述社会功效,尤其对化解实体经济经营风险、助推实体经济跨越式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主要面临两大障碍:一是融资贵、融资难障碍;二是抗经营风险能力低和经营失败的障碍,且两种障碍互为作用,共同让实体经济滑向了不利经营局面。从融资贵、融资难问题看,主要是大多数实体经济自身处在产业链底端,存在产品质量不高、经营管理方式滞后等问题,因而在市场上竞争力脆弱、话语权不强。这种经营现状使实

体经济信贷基础不牢,信贷能力较低;也使银行在对实体经济信贷上存在很多担忧和畏惧,更加剧了实体经营融资难、融资贵困局。出现这种现状,靠实体经济自身努力改善经营现状、提高经营效益和提振银行信贷信心,需要很长时间,一时无法实现。而靠银行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也存在勉强之嫌,且银行也不一定买账,因为银行曾经在支持小微实体经济信贷中吃了不少“亏”,越是信贷支持力度大的地区,越发造成高不良信贷率,让银行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而保险业“新国十条”推出专门针对实体经济融资难的“政银保”模式,即针对支付能力较弱的企业和人群,由政府、银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贷款风险。这种模式一旦在全国铺开并推广,可解决银行一直以来在信贷中存在的贷款风险担忧,尤其可破解涉农企业无抵押、无保证金贷款难等问题。同时,将此前由银行一家独自

承担信贷风险改为共同分担贷款风险,可消除银行信贷后顾之忧,有利于极大增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信心,从而加大对实体经济信贷投入,并为最终破解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奠定坚实基础。

从实体经济经营过程看,不仅面临市场风险、管理风险、自然风险等系列风险,生产和市场不确定性、产品价格不稳定性等情况亦较为严重,这些都成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拦路虎”,也使实体经济各类经营风险隐患一直难以根除,也始终成为银行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保险“新国十条”研究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巨灾再保险等制度,意在逐步形成财政支持下的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鼓励各地根据风险特点,探索对台风、地震、滑坡、泥石流、洪水、森林火灾等灾害的有效保障模式;并将制定巨灾保险法规,建立保险巨灾责任准备金制度以及巨灾风险管理数据库等等。而且更要求在农业保险方面建立

完善的保险机制,不仅可征收巨额保险费用,更能为林业、蔬菜、家禽等“三农”企业提高经营风险保障。由此可见,保险“新国十条”能为实体经济撑起发展“保护伞”,真正发挥“助推器”作用;银行也会因为实体经济保障功能的增强,在信贷上消除担忧心理,可放开胆子支持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也必然迎刃而解。

此外,随着人口拐点到来,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需为员工交纳的各项保险费用也越来越多,不少实体经济难堪重负,成了企业发展转型和产品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而保险“新国十条”提出“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可让实体经济扩大商业保险范围,将大病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成功推向商业化保险之路,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实体经济经营负担,也可提高职工保险保障水平,为实体经济振兴奠定牢固基础。